

## 欧亚人口与家庭历史国际学术 研讨会观点综述

纪 南

欧亚人口与家庭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EurAsian Project on Population and Family History International Meeting)于1998年11月25~28日在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举行。这次会议实际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来自美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典、日本和中国的20位学者针对欧亚人口与家庭历史议题进行讨论,二是由来自美国和中国的20余位学者集中对中国婚姻和家庭问题开展讨论。此次会议汇集了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他们从不同的视角探讨、分析婚姻家庭的历史和现状,并进行不同区域的比较,从而使彼此视野扩大,认识加深。会议学术气氛甚为浓厚,参加者均感获益良多。

### 1. 关于东亚人口与西欧人口发展的比较研究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李中清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王丰在其长篇论文“中国的人口行为”中提出了诸多新颖独特的观点。其突出之处是在对中国近三百年历史人口研究的基础上,向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提出了置疑或者挑战。具体地说,他们总结了留存至今的中国历史人口行为的四个有特色的方面。关于死亡率。马尔萨斯认为,“对中国人口来说,饥荒是所有现实抑止中最有力和最频繁的”。但是新近的历史研究表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溺弃女婴可能更为重要。相比较而言,在西方社会,溺婴是少有所闻的——至少从17世纪以来是如此。这种较高的女婴和女童死亡率产生了中国人口体系的第二个显著特征:婚姻市场的性别失衡。女性普遍都结婚且结婚较早,而男性往往结婚较晚。可婚女性的短缺导致较大比例的中国男性不能结婚。但在西方,男女两性的婚姻都受到限制,而在中国,至少对于女性而言是普遍结婚的。然而,持续的高结婚率并没有促使中国的生育率上升。西方已婚妇女在没有避孕条件下的总和已婚生育率(TMFR)平均可达8~9个孩子,而在中国,已婚妇女的TMFR为6或者更低。已婚生育率低是中国人口体系最显著的第三个特征。与马尔萨斯及其同时代的学者认为中国生育率是相当高的观点相反,中国人口的总体生育率可能不比欧洲的生育率高多少,但中国的已婚生育率要比欧洲的低很多。最后,尽管中国人有强烈的血缘观念,并且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依赖于家庭和亲属,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父母亲不得不频繁地用虚拟的亲属关系来代替其生物繁殖力,这是低生育率和低存活率的一个副产品。收养关系在西方几乎是不存在的。中国和西方这些不同的人口特征和历史传统导致了中国与西方迥然不同的人口转变过程。在西方,人口转变过程是不连续的,而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则是连续的。而且,西方人口转变的发生是个人力量在从婚姻到生育和死亡行为上延伸的结果,而中国的人口则是从家庭到国家的集体决策过程扩张的结果。上述观点当然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不过其视角的确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George Alter教授在“人口转变前的欧亚生育策略”一文中指出,所

有社会面临着调整人口与可利用资源之间的关系这一马尔萨斯问题。为了描述 18 和 19 世纪比利时、中国和日本的农村社区在人口增长上所受不同人口行为的影响,在欧亚人口研究计划中采用了稳定人口模型,除了马尔萨斯的积极抑制(死亡)和消极抑制(婚姻)之外,迁移、溺婴和婚内生育调节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发现,这三个社会都将他们的生育率远远降至生物上最大生育能力之下。可见他们采用不同的方式达到了同一目的。与马尔萨斯认识相反,两个亚洲社会的人口控制较少依赖积极抑制,而更多的依靠婚内有意识的生育控制。具体来讲,比利时 Sart 的居民是依照马尔萨斯的范式行事的。他们主要依赖晚婚和高比例的终身不婚这些预防抑制手段。然而,日本和中国的事例则表明被马尔萨斯低估了的行为所具有的重要性。即他意识到溺婴在中国被广泛采用,并将其归结为穷困潦倒的父母绝望的表现。很清楚,马尔萨斯对中国和日本夫妇将溺婴作为家庭计划的一种方法这一点认识不足。并且,他无法了解他们婚内的低水平生育。

李中清和日本学者 Emiko Ochiai 提交的论文“欧亚社会组织和人口行为 1750~1900:多区域的重新评价”指出,欧亚比较研究的初步结果证实了欧亚西东部的内部组织和人口行为有明显的反差。尽管疆域甚至人口关联还不清楚,然而二者区分的基本方面是明显的。东亚的家庭较之西欧更复杂。在欧洲,三代居住在一起的大家庭比例很低(除了意大利曾占 15%以外);而东亚的日本则占 30%,中国达到 60%以上。结果,中国和日本的简单家庭只占 23%和 31%,复杂家庭占 62%和 60%。不过,中国的多数复杂家庭以旁系亲属的形式组合,而日本直系组合占多数。在婚姻问题上,尽管在我们所研究的人口对象上有一些惊人相似的价值观,不过在东西方至少有三点重要的不同:东亚年轻男性和女性结婚早于西方,东亚妇女普遍结婚并且倾向于采用不同的年龄类型,从性别上看妻子大于丈夫的情形少于欧洲。我们认为对于这些问题还需进一步分析研究。

## 2. 关于婚姻问题

婚姻问题是与会中国学者论述最多的问题。其中既有从历史角度着眼的,也有从现实状况分析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郭松义在其论文“清代男女的初婚年龄”中分析了清代男女的初婚行为。该文资料宏富,样本量大。特别是女性样本达 17 174 人。这在以往国内婚姻史研究中是不多见的。根据作者的研究,清代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 17.28 岁,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 19.76 岁。考虑到样本中有半数以上取自士宦家庭,而士宦子弟中男性初婚年龄要低于普通百姓,女性又会稍高这一因素,作者认为将男性初婚年龄定在 20~21 岁,女性定在 17~18 岁,大致是合适的。作者还进一步考察了初婚女性年龄的地区差别。西北地区偏低,在 16~17 岁之间。江浙地区偏高,为 18~19 岁。其它地区差异不十分明显。夫妇年龄差异也是作者分析的一个方面。在所统计的 4 140 对夫妇中,夫妇同岁的 629 对,占 15.19%;丈夫大于妻子 2 275 对,占 54.95%;妻子大于丈夫的 1 236 对,占 29.86%。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定宜庄在“满族早期的收继婚制及其在清代的遗存”一文,从民俗和制度上对满族收继婚的演变历史作了研究。认为收继婚在北方各民族中绵延不已的原因有以下几种:(1)保存种姓;(2)保证家庭财产不致外溢;(3)部落间的联系纽带。收继婚作为一项与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制度,曾在满族社会普遍流行。然而,深受汉文化影响的皇太极从即位伊始,对收继婚俗的禁绝不遗余力。这种努力是与满族社会所发生的各种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步的。虽然清入关之初仍然可见收继婚俗的残余,但性质已与早期不同。到清中叶,随着家族制度的淡化以及八旗各项赡养措施的建立及健全,收继婚俗在八旗社会内已基本消失,

同族之内的男女之防已成为旗人的共识和自觉行为。

江西师范大学梁洪生的“乡村婚姻与社会变迁”是一篇将传统与现实结合起来考察婚姻行为的研究报告。通过对江西乐安、金溪、波阳和乐平等五个村庄近五十年来“同宗相婚”现象的具体调查后发现,“同宗相婚”是本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乡村出现并渐为常见的一种婚姻现象。它以同住一村并为某一先祖所传的“宗亲”男女为表现形式,因而是对明清以来民间一直遵守的“同宗不婚”禁忌的破除。梁认为这一婚姻现象产生的法律背景是:民国以来婚姻立法中逐渐引入欧洲大陆民法中的“直系血亲”、“旁系血亲”、“亲等”等概念,使凡按中国传统血缘计算中的“九族”、“五服”以外的“宗亲”通婚皆为合法;而这一新的法律规范真正在乡民婚姻中得以体现,则是50年代初土改等政治运动将传统时期在乡村切实维护“同宗不婚”禁忌的家族组织及其权威否定以后。但在一段时期内,由于过去家族组织内“房份”的实际功能很强,并在血缘关系上更为接近,由此而影响最初的同宗通婚都发生在不同房份的男女之间,据此可以认为:在“同宗不婚”禁忌被破除之后,乡民之中实际上还存在一个“同房不婚”的禁忌。

厦门大学郑振满的“近百年闽东沿海的婚姻、家庭与生育率”则是一篇典型的回溯调查报告。该文对福建连江县浦口镇官岭村50位60岁以上的妇女作了个人生活史问卷调查。按照本调查,在本世纪20~40年代,受访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约为20.4岁。其丈夫的平均初婚年龄约为26.2岁。它表明,晚婚在当地颇为流行。晚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家贫。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受访女性中不少是到夫家数月乃至数年之后才正式结婚,而这时期主要结婚费用早已支付,似乎是有意推迟结婚时间。此外,民国时期本村多数男子以经商和航海为生,漂泊不定,这可能也是导致晚婚的重要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纳日碧力戈和内蒙古行政学院王俊敏的“族际家庭与族际婚姻:呼和浩特蒙汉通婚”一文,从民族学和人类学角度对80年代与90年代呼和浩特市的蒙汉通婚状况作了调查。在1983年和1984年对蒙古族1241人所作调查中,与汉族通婚和恋爱者668人,占总数的54%;在本族内婚姻和恋爱者573人,占46%。与汉族通婚和恋爱的668位蒙古族中,女性318人,占48%;男性350人,占52%。根据对该市1994、1995两年原始结婚登记表统计,1994年蒙古族族内婚149对,占当年蒙古族族婚姻的22.3%;族际婚520对,占77.7%。1995年蒙古族族内婚40对,占当年蒙古族婚姻的30.8%;族际婚90对,占69.2%。另外,在498对蒙汉通婚中,蒙古族男性占47%,蒙古族女性占53%。谈及该地蒙汉通婚的背景,作者认为,在长期的历史沿革中,呼和浩特地区已经成为蒙汉以及其他诸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口相交互动的锋面,构成一个独特的、不同于农收区的经济文化系统。蒙汉通婚的文化模式、经济类型以及人口地理条件,便在呼和浩特地区逐渐形成。在这里,以汉族为主要代表的农耕文化系统和以蒙古族为主要代表的游牧文化系统,先是冲突迭压,后来交织成为一种新的综合性文化系统。

南开大学杜家骥提交的“中国古代的近亲结婚问题”一文,概述了中国古代近亲结婚的历史,以及官方对此所持态度。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对姻亲之间的婚姻,唐以后有系统的法律限制。对中表婚北宋后才有禁令,清代中期明令弛禁。实际中表婚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他进一步指出,国家法律关于近亲结婚的某些律令过严,脱离现实,因而执法者不按和不完全按律文执行,所以对其制约作用不能做过高估计。

国外学者也对本国的婚姻行为作了分析。瑞典伦德大学的Christer Lundh在“工业革命前瑞典的婚姻”一文中对瑞典的终生不婚比例、初婚年龄、初婚年龄差异、再婚状况作了分析。在1750年,45~49岁年龄组男性不婚比例低于5.5%,同一年龄组的女性高于10%。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1750~1900年,不婚比例增加一倍。平均初婚年龄呈现以下变化:1751~1800年,男

为 27.2 岁,女为 25.7 岁;1801~1850 年,男 27.5 岁,女 25.9 岁;1851~1900 年,男 28.3 岁,女 26.2 岁。在工业革命前,离婚很少,然而再婚却很流行,特别是男性,19 世纪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登记结婚的男性为再婚的鳏夫。

意大利乌代恩大学的学者 Marco Breschi 和 Matteo Manfredini 的“在过去 5 个世纪 TUSCANY 有关婚姻方面的影响、数字和统计”一文,分析了意大利的婚姻特征。在意大利,婚姻对人口的调节作用在许多方面产生影响;在中部谷物种植区,婚姻有一种按照农场规模调节家庭规模的作用;在山区人口中,低水平婚姻意在人口和有限的资源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小农所有者集中的意大利南部一些地区,婚姻特征是近代式的。具体来讲,女性初婚年龄在 18 世纪表现出提高的趋势,也许在 19 世纪的上半叶稍微降低一些。1700~1749 年,波动范围为 22~27 岁,并且经常在 24~25 岁。在随后的 50 年(1750~1799 年),平均年龄在最小 24 岁和最大 28 岁之间变动。在 18 世纪,男性初婚在 27~33 岁间。

日本学者 Satomi kurosu 的“初婚类型在日本 Tokugawa 时期的地区差异”一文主要探讨了 18 世纪至 19 世纪日本东北、中部和西南部三个地区的四个村庄的婚姻类型。其基本初婚模式是:初婚年龄女性在 14~25 岁的范围。男性在 17~28 岁的范围。并且初婚年龄日本西部要晚于中部和东北部。具体来看,东北部的农村地区(1716~1870 年)平均初婚年龄为男性 20.2 岁,女性 18.5 岁;在西南沿海渔业地区(1793~1869 年),男性为 28.5 岁,女性为 21.2 岁。可见,日本农业地区的初婚模式与中国近代之前有相似之处。

### 3. 关于生育控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伯重的“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一文认为,在中国,对生育进行控制并非一种“近代”的现象。20 世纪以前很久,生育控制就已是中国一些地方人口行为的重要特征之一,江浙地区颇具代表性。由于通过生育控制有效地降低了生育率,所以在南宋后期至清代中期的五个时期内,这一地区的人口变化方式由先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此时期的低速增长,从而保持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对和谐。具体的节育方法有药物与非药物两大种。他进一步指出,宋元明清时期,江浙人民在生育控制方法的多样性和有效性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其所达到的水平,超过了近代以前的西欧。并且由于民俗文化的发展和商业的发展,生育控制方法在江浙日益普遍,已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进而对江浙的人口变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那种认为近代以前江浙民众的人口行为只是一种“自然”的生理行为的设想,肯定是不符历史事实的。

南开大学常建华的“清代溺婴问题新探”一文,对清代溺婴习俗的地区分布、原因、后果与民间童养媳对策和清朝的溺女禁革与育婴堂建设作了分析。认为溺婴行为产生的原因有:(1)家庭抚养维艰,(2)奁费高遣嫁困难,(3)出于生男的性别选择考虑,(4)家庭子女多,(5)重男轻女,(6)财产继承考虑,(7)未婚或通奸而生子。溺婴造成人口性别比失调,男多女少,从而使男子成婚困难,引发多方面的社会问题;另一后果是减少了人口数量。他认为,童养媳制度是民间减少溺女的主要对策,可以解决家贫者的抚育和遣嫁问题,减少经济开支,进而起到减少溺女行为的作用。由此提出该制度是一项社会发明,是古代中国生育行为自我调节的一种机制,此外,他还对官方和民间对溺女的禁革以及育婴堂的建设作了论述。

### 4. 关于家庭结构

由于中国历史上家庭结构方面的系统资料较少,极大地限制了此项研究的开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王跃生的“十八世纪中国家庭结构分析”一文选取中国第一历

(下转封四)

(上接第 64 页)

史档案馆所藏乾隆四十七年至乾隆五十六年(1782~1791年)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档案中的 1 303 件个案资料作为分析样本,试图从中揭示 18 世纪中后期中国家庭结构的基本状况。根据这项个案调查,该时期全国总的家庭结构为:复合家庭占 6.75%,直系家庭占 30.93%,核心家庭占 56.54%,单人家庭占 4.45%,残缺家庭占 1.23%。与以往认识不同的是,无论从全国角度,还是从地区比较方面,或者从职业身份上看,核心家庭的主要数据比例均在 50%以上,而复合家庭的整体水平不足 10%,表明小家庭已是该时期的主流家庭形态。作者还进一步分析了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即人口的数量增长过快,人口的迁移流动加速,从而促使大家庭分解。同时个案资料对当时的父母兄弟分财别爨现象有充分反映,由此可以看出,父母兄弟另立门户的社会性、道德性和政策性限制已大大减弱。同时,本项调查中包括了较高比例的自耕农、佃农、佣工等社会中下层出身者,经济条件的限制使他们很难维系较复杂的家庭结构。不过,直系家庭所占有较大比例也说明,父母同至少一个已婚子女生活在一起并由子女承担起养老责任仍是普遍的社会现象。

### 5. 关于人口死亡研究

复旦大学侯杨方的“传统中国家族人口的死亡模式”一文,利用明清时期江南两个家族上海曹氏、澄江范氏的家谱作为基本材料对家族人口的死亡模式与时代背景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两个家族的死亡行为受到外界环境,如自然灾害、经济波动等的强烈影响。由于中国普通家族的家谱对未成年人口的死亡记录遗漏甚多,成为中国历史人口研究的一大障碍与难题。为此作者采用建立相关模型生命表的方法来估计未成年人口的死亡状况。按照此项研究,两个家族的婴儿死亡率都非常高,超过 250%;0 岁时平均预期寿命都比较低,不到 30 岁,相当寇尔-德曼(Coale-Demeny)经验模型生命表中西区第五级的水平;大约有一半的男子不能活到 22 岁这一普遍的初婚年龄。

从以上可以看出,历史人口比较研究在国外学者中得到加强,而这种比较研究是建立在对各个不同区域人口行为特征所作深刻分析和全面把握基础之上,否则将会使比较研究流于空泛。中国学者则将研究对象确定在某一个具体时期特定的人口行为上,因而提高了分析深度。特别是历史人口的数理分析、实证分析已在国内学者中采用。这种学术交流将会使国内外研究者获得更多的信息,为彼此研究工作的改进提供帮助。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

(本文责任编辑:朱 萍)

---

## 中国人口科学(双月刊)

一九九九年第 2 期 总第 71 期

地 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五号

电 话:65137744 转 5419

邮政编码:100732

国内邮发报刊代号:82-426

主 编:田雪原

编辑出版:《中国人口科学》杂志社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

印 刷 者:北京海淀区划印刷厂

国内发行:北京市邮局报刊发行局

订 购: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

国内统一刊号:CN11-1043 ISSN 1000-7881 4 月 1 日出版 定价 4.00 元